



追寻延安时期的火红年味
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晨 孙正好 李浩

欢快的秧歌扭起来，喧天的锣鼓敲起来，大红的绸带舞起来，喜庆的歌儿唱起来！男女老少，家家户户，欢声笑语，连成一片，每到正月，整个陕北大地笼罩在浓浓的年味当中。

锣鼓喧天辞旧岁，欢天喜地过大年。当我们沉浸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春节氛围中，有没有想过延安时期是怎样过年的呢？那时候又有哪些火红的年味？革命人又如何在这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中鼓舞士气、激扬斗志？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记者再回陕北，重温那段孕育着无数希望、充盈着无限生机的岁月芳华。

红色记忆

“除夕之夜，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。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，院子的地上铺满了炸得粉碎的红红的绿绿的炮皮。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土窑洞里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‘八碗’。”这是作家路遥笔下的陕北春节。作为黄土文化集中区，陕北大地年味充满着浓郁的黄土风情：窑洞里，蒸的是黄馍馍，贴的是红窗花；窑洞外，敲的是震

天锣，扭的是大秧歌。陕北是革命老区。陕北的春节拥有更多火红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。从新秧歌运动、新年画运动到双向奔赴的军民大拜年，陕北的年味既有“山丹丹花开红艳艳”的热烈，也有“高楼万丈平地起”的豪情，更洋溢着“试问九州谁作主，万众瞩目清凉山”的自信。

延安时期有哪些火红年味？革命人又如何在这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中鼓舞士气、激扬斗志？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记者再回陕北，在飞扬着红旗红红腰带的黄土地上，重温那段孕育着无数希望、充盈着无限生机的岁月芳华。

接地气的秧歌“火出圈”

“小窑洞里，灯光如豆，安波坐在一张小桌子前……一支曲子谱完，感觉不理想马上就改，只是开头的‘雄鸡，雄鸡，高呀！高呀！’一曲，就不知道改了多少遍。”临近春节，冬日暖阳中的延安年味渐浓，修葺一新的鲁艺旧址静候着佳节到来。镌刻在旧址安波纪念馆、描绘“小调大王”安波为《兄妹开荒》谱曲的这段文字，将时针拨回到81年前那个年味十足的春节。

1943年春节，延安城中锣鼓喧天，一场精心筹备的军民联欢会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拉开帷幕。尽管黄土飞扬，天寒地冻，但正如台下安波的回忆所言：“一座巍巍的人山赫然地从平地竖起。”

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，来自鲁艺的艺术家们在“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者服务”的号召下，将创作之笔对准人民、用群众语言创作后的汇报演出。

“挑起担儿上山岗，一头是米面馍，一头是热米汤。”在两万多军民的翘首以盼中，王大化化身系红腰带，顶着陕北人民最熟悉的白羊肚手巾跨上舞台，身边是穿着花棉袄的李波。两人唱的是陕北秧歌调，扭的是陕北秧歌舞，演的是陕甘宁边区农民马丕恩父女“早起晚眠，努力生产”的劳模事迹。虽然缺乏专业场地，也没有高端音响助阵，但在观者潮水般的叫好声中，以劳苦大众为主角的《兄妹开荒》，火了！

“《兄妹开荒》轰动了整座延安城，火到什么程度？《解放日报》配发了社论，刊登了曲谱。王大化和李波成为那个时代的‘顶流’，市面上出现了王大化牌的香烟、肥皂。”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，“当时很多群众到鲁艺看秧歌剧，不说剧名，都说‘去看王大化’。这部剧原名叫《王二小开荒》，也是群众把它喊成了《兄妹开荒》。”

《兄妹开荒》成为延安新秧歌运动中的代表作。“在陕北，秧歌历史悠久。千百年来，陕北人用扇子寓意风调，用花伞代表雨顺，用扭秧歌庆贺祈福。他们

如仙踏云地走，如醉发狂地扭，如风戏柳地摆，如浪奔腾地跳。”国家级非遗项目“陕北秧歌”省级传承人贺世成介绍。

扭秧歌至今仍是陕北最强春节仪式感之一。每逢正月，炸裂的鼓点配合飞舞的红腰带，让这片黄土地沉浸在歌舞狂欢之中。

“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，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，是粗糙的东西，但也是最生动、最丰富、最基本的东西……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。”延安文艺座谈会后，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陕北秧歌成为艺术家联系群众、深入群众的“金钥匙”，鲁艺成立了秧歌队。曾经接受西方艺术熏陶的艺术家们，开始在传统文化、民间文化的艺术宝库中挖掘创作灵感。

“陕北原来只有秧歌调、秧歌舞，没有秧歌剧。鲁艺的艺术家们拜群众为师，通过田野采风，在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去粕存精、提炼创新，开创性地发掘了有情、有故事、有情节的秧歌剧。”刘妮说。

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《兄妹开荒》横空出世，新秧歌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。

“鲁艺大秧歌队彩排的那个晚上，当锣鼓敲打起来，秧歌舞跳起来的时候，一种感奋之情涌上心头。”鲁艺秧歌队乐队成员、作曲家李焕之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。

他也成了秧歌剧的一员，有时敲锣鼓，有时拉手风琴。“陕北民间大秧歌的健壮、豪放的舞步、舞姿……那种沉宏、铿锵的秧歌锣鼓点……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、那么生动，而又那么亲切近人。”

据《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——延安志》记载，1943年春节，鲁艺秧歌队成员多达150人，在杨家岭、中央党校、文化沟等地进行巡回演出。除了《兄妹开荒》，还上演了为三五九旅战士们新编的秧歌舞《摇花篮》等文艺作品。

双向奔赴的春节大拜年

“1944年春节，新秧歌活动闹得更红火了……桥儿沟乡的秧歌队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就到鲁艺院内拜年来了。”“我很喜欢那位老领头唱的秧歌调……唱出了与解放了的人民之间的亲密无间的情谊。”

这段文字出自延安文艺纪念馆收藏的李焕之著作《音乐创作散论》。通过回忆延安时期春节拜年等种种细节，李焕之创作了传世经典《春节序曲》，至今仍被人称为过年专属“BGM”。

“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拜年方式，往往简单淳朴又情意浓浓，除了秧歌拜年，还有座谈聊天，或是互致问候。”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教授高慧琳说，比如，1945年农历大年初一，中央领导带着警卫员到枣园乡政府给群众拜年。其间，陕甘宁

边区的劳动模范也来给中央领导拜年。

蔬菜、鸡蛋、黄酒、油馍……延安时期，军民之间的新春礼物，往往就是小杂粮和农家土特产。1943年春节，“拥军优属、拥政爱民”的“双拥运动”在延安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。“正月里来是新春，赶上了猪羊出呀了门。猪啊，羊呀，送到哪里去，送给咱英勇的八路军。”首演于当年的《拥军秧歌》，以质朴热烈的唱词，勾勒出军民鱼水情深的热闹年味。

“新年前后，子长募集慰劳品大肉万斤、豆子70石、鞋5000余双。吴起赠每户抗战家属大肉2斤。”这是1944年新春佳节，陕甘宁边区涌现的拥军热潮之一。

1946年春节，当时的劳动英雄杨步浩带着老乡，一路敲着锣鼓、扭着秧歌到王家坪拜年，给中央领导

用艺术礼赞生活

“联欢要提倡节俭”“秧歌不宜太多”“要关心群众疾苦”……延安时期春节前后的报刊上，常常刊登着暖心的过节提醒。“比如1946年陕北部分地区遭遇灾荒，春节来临前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《解放日报》发出指示，要求各地组织秧歌队时要遵循自愿原则，不宜铺张浪费，时间不能太晚，以免耽误群众生产。”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胡建满说。

“人民这么拥护共产党，根本原因是共产党让劳苦大众找到了做人的尊严。”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副院长杨晓红说。正如埃德加·斯诺在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中的所见所闻：少先队员们喜欢红军，因为“他们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，吃住都像人”；穷人分到了田地，娃娃能上学；很多工人过的“是一种健康的生活，有运

动、新鲜的山间空气、自由、尊严、希望”。

“红军未到的时候，这是一个荒凉的穷苦的城，然而人民的背上压着繁重的捐税。”诗人何其芳在《我歌唱延安》中如此写道，红军到陕北后，“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，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，背着行李，燃烧着希望，走进这城门。”“这个活着的城像一个活着的人，不断地生长。”他开始在自由、宽大、快活的空气中“为少男少女们歌唱”，感叹“生活是多么广阔，生活又是多么芬芳”。

“共产党领导下生活的巨变，是延安时期火红年味的现实土壤。”杨晓红说，“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，劳动人民就是要在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里，用拜年、秧歌、社火等最朴实也最隆重的方式，表达翻身做主人的喜悦，表达最真实的欢畅。而艺术家

们通过深入群众，创作大量接地气的年画、秧歌剧等文艺作品，为群众代言，用艺术礼赞这种全新的生活，全新的时代。”

当春节的脚步走来，今天的革命圣地，火红年味历久弥新：悠扬的民歌唱起来了，欢腾的腰鼓打起来了，热情的秧歌又扭起来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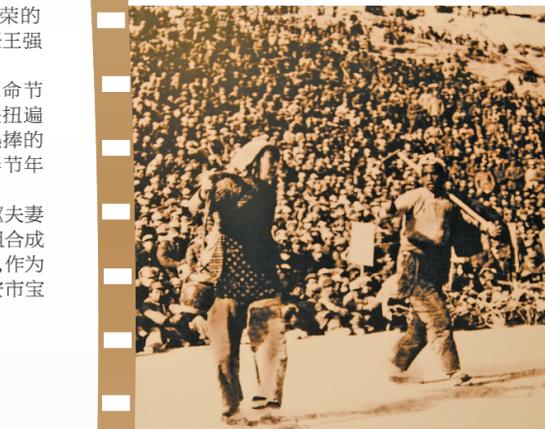
这“龙腾虎跃盛世春，五谷丰登又一年”的神州美景，恰如“人民音乐家”冼星海于1938年写给妻子钱韵玲的信中所愿：“我们到陕北去吧，那里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勇气，那里使我们更了解真正的爱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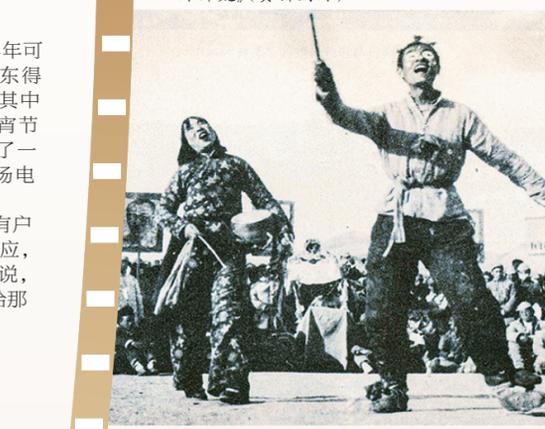
● 鲁艺旧址东山上的安波纪念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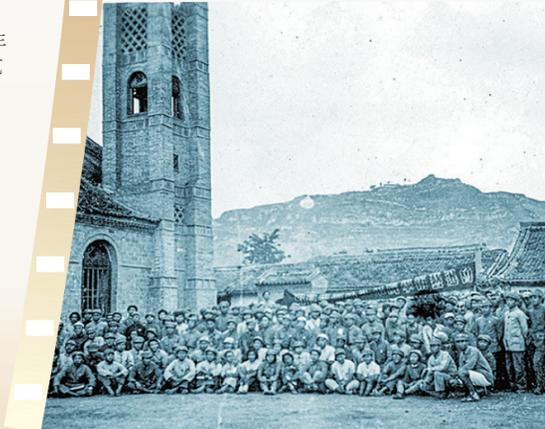
● 1943年鲁艺秧歌队在延安演出，排头者为刘焯（资料图片）



● 1943年春节王大化与李波演出《兄妹开荒》（资料图片）



● 鲁艺秧歌队演出的《拥军花鼓》（资料图片）



● 鲁艺师生合影（资料图片）